

中共党史资料

林伯渠日记 (1935 年 5-11 月)

井冈岁月今忆

毛泽东与光明日报

“四清”记

十月革命与俄国现代化进程

马林来华与国共合作

关于旗帜问题的历史回顾

64

总第六十四辑

1997 年 12 月出版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 编
中央档案馆

98852

D239
6-52

中共党史资料

第六十四辑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
中 央 档 案 馆 编

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7年·北京

主 编:韩泰华

副 主 编:杨公之
陈 夕

文献编辑:罗一恒

本期责编:刘荣刚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共党史资料第 64 辑/韩泰华主编. —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7. 12

ISBN 7-80136-085-0

I. 中… II. 韩… III. 中国共产党-党史-资料 IV. D23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7)第 07577 号

中共党史资料(64 辑)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 编
中 央 档 案 馆

出版发行:中共党史出版社

通讯处:北京 1929 信箱 邮编:100091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颐和园路 35 号

电话:(010)62881570 传真:(010)62881532

经 销:新 华 书 店

印 刷:北京朝阳科普印刷厂

850×1168 毫米 32 开 7.125 印张 160 千字

1997 年 12 月北京第 1 版 199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3000 册

ISBN 7-80136-085-0/K·75

定 价:6.00 元

目 录

文献资料

林伯渠日记(1935年5—11月) (1)

回忆录

井冈岁月今忆 欧阳毅(35)

毛泽东与《光明日报》 穆 欣(50)

“四清”记 李 新(85)

访谈录

十月革命与俄国现代化进程

——访 吴 恩 远 陈 夕(112)

专题资料

马林来华与国共合作 王德京(127)

1925—1926年胡汉民的莫斯科之行 李玉贞(146)

苏联、共产国际与东北抗日游击战争 郭红婴(156)

人物介绍

- 胡耀邦与青年团工作…………… 陈 模(171)
李硕勋在香港、海南的英勇斗争 …………… 何锦洲(181)

地方党史

- 新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及作用…………… 王 棣(190)

资料文摘

- 关于旗帜问题的历史回顾…………… 郑必坚 龚育之(200)
邓小平何时首次提出“一国两制”的概念?
…………… 高 放(203)

译文选登

- 联共(布)领导对国民革命军北伐态度的演变
…………… [俄]A. И. 卡尔图诺娃著 马贵凡译(207)

信息窗

- “中国共产党历史资料丛书”概述…………… 霍海丹(219)
新书选介…………… (224)
封面照片:黄洋界战斗遗址

国社会的现状,并开始参加现实的运动”^①。

西湖会议后,陈独秀、李大钊等一些党的负责人首先加入了国民党。这是孙中山采取容共政策的明确表示,也是马林极力推动的国共党内合作的开始实现。

在马林和中国共产党的推动和帮助下,孙中山着手改进国民党的组织和工作。1922年9月,他召集在沪的各省国民党负责人开会,商谈如何改进国民党问题,马林和陈独秀也应邀参加了会议。孙中山还指定包括陈独秀在内的9人组成“国民党改进方略”起草委员会,拟定国民党的纲领和章程草案。在此期间,马林曾向国民党的中央干部讲话,建议他们在全国的工人和农民中积极进行宣传工作。1923年元旦,经孙中山审定的《中国国民党改进宣言》正式发表,它不仅对三民主义作了某些新的解释,并据此提出了一些较为进步的政治主张。接着,国民党又召集在沪党员开会,正式宣布党纲和总章。会后,孙中山陆续任命了国民党总部各机构的负责人员,共产党员陈独秀被委任为参事,林伯渠为总务部副部长,张太雷担任宣传部干事。这些都为国民党彻底改组作了初步准备。

在这次来华期间,马林还大力推进苏俄政府和国民党的合作。苏俄对华谈判全权代表越飞通过马林与孙中山保持了密切联系。但是,越飞在实践中不能不执行其政府的既定方针,同吴佩孚进行联系,并要求孙中山也和吴佩孚密切合作,甚至幻想建立一个孙吴联合的政权^②。越飞和马林之间因此出现了不一致,1922年底越飞委托马林回莫斯科请示。

在第二次来华期间,马林依靠共产国际领导的支持,成功地使中共中央改变了不加入国民党的政策,为国共合作的实现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

^① 《“二大”和“三大”》，第170页。

^② 《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第1卷,第107页。

一个真正强有力的群众党”^①。为此，国民党必须“抓住民众”，并“站在指导民众地位”^②。在此期间，应孙中山的要求，马林和陈独秀一起制定了一个国民党改组计划草案，并与孙中山和其他国民党领导成员进行了讨论。孙中山还要马林参加国民党，“直接代他从事党的改组工作”^③。但是，马林感到，此事如果没有取得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同意，如果他不能仍然作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代表，“那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另外一个人就会带着建立中国群众性政党的美梦前来，这种谬论将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名义得到宣传，我的处境就会非常尴尬。”“如果因此可能导致我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脱离关系，那我是不会同意的。”^④这样，马林没有参加国民党。

在积极推动国民党改组工作的同时，马林还大力协助中共中央筹备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中心议题是讨论国共合作问题。中共“三大”于1923年6月12日至20日在广州举行。共产国际原决定派马林和维经斯基二人代表国际参加，但维经斯基因故未能来华，马林便成为参加大会的唯一国际代表。然而，张国焘由于得到维经斯基等人的支持，并不买马林的账。他在会前和会议期间，任意散布马林是“右派”，说他“崇拜国民党”，“想把共产党搞垮”等等。在大会讨论中，张国焘意以“左派”自居，公然说：“也许我们是错误的，但我们宁可保持左，左的错误比右的错误容易改正”，“希望这次会议将通过略左一点的决定。”^⑤

中共“三大”关于国共合作问题争论的具体情况，由于会议的正式记录没有保存下来，我们不可能作全面准确的介绍。不过在马林档案中有几份“三大”期间的笔记以及大会前后写的有关此次会议的一些报告和信件，其中记载了若干代表在会上发言的要点。尽

① 孙铎：《吴佩孚与国民党》，《向导》第24期。

② 孙铎：《第二次世界战争》，《向导》第25期。

③④ 《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第195页。

⑤ 同上，第242页。

管这些记载由于经过多次翻译,可能有不够准确全面之处,但作为主要当事人的记载,对于研究中共“三大”仍不失为一种重要的原始资料。再参照张国焘、蔡和森等其他当事人后来写的报告与回忆,“三大”期间关于国共合作问题的争论情况大致还是清楚的。

中共“三大”上争论的焦点,同共产国际中的分歧一样,集中在中共的主要任务是什么这个问题上。用马林的话来说,就是“我们的党员是应通过加入这个国民党去完成共产党的任务抑或是应将我党人力集中起来去为尚未分化成完全独立的力量的工人阶级建立一个工人党”^①。围绕这个问题出现了对立的两派意见,一派以马林、陈独秀、瞿秋白为代表;另一派以张国焘、蔡和森、刘仁静为代表。会议开始时,陈独秀根据共产国际一月决议的精神起草了一个详细提纲,其中强调,“我们的任务是把国民党发展到全国去”,“要批评国民党内的封建主义策略”,“迫使国民党走上革命宣传的道路”,“为此必须建立由工农组成的国民党左派”;他认为,“工人的政治利益首先就是国民运动的利益”,“我们党将作为一个强有力的集中的组织继续存在,它同样主张在全中国各地做国民运动。”^②马林则依据共产国际一月决议中关于中国的中心任务等内容,强调“我们就应该加入国民党,我们要把国民运动作为中心任务”^③,“为了开展政治活动,我们要鼓励同志们到国民党中去,并把用这个办法支持国民革命看做中国共产党人的主要任务”。^④他认为,所有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都应该贯彻国际的指令,加入国民党,从事国民运动,而且要发动工人农民参加国民党,以培养强有力的国民党左翼。

与此相反,张国焘却提出“国民党现在并不代表国民运动”,工人阶级虽然“还很年轻,力量还很弱,但是它在斗争中已经显示出

① 《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第229页。

② 同上,第247页。

③ 同上,第232页。

④ 同上,第245页。

相当力量”；他认为共产国际一月决议中关于中共党员“留在国民党内是适宜的”只是想已经加入国民党的同志继续留在国民党内，并未要求所有共产党员都加入，“这项工作不是压倒一切的”^①；他强调“发展共产党的唯一途径是独立行动，而不是在国民党内活动。”^② 蔡和森也指责陈独秀“把工人置于国民党旗帜下”，强调要“建立一个独立的工人政党”^③。

经过热烈的讨论，大会最后通过了陈独秀提出的《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决议案》。决议指出“半殖民地的中国，应该以国民革命运动为中心工作，以解除内外压迫”。“中国现有的党，只有国民党比较是一个国民革命的党”。“工人阶级尚未强大起来，自然不能发生一个强大的共产党——一个大群众的党”。因此，应遵循共产国际的指示，“中国共产党须与中国国民党合作，共产党员应加入国民党”。“我们加入国民党，但仍旧保存我们的组织，并须努力从各工人团体中，从国民党左派中，吸收真有阶级觉悟的革命分子，渐渐扩大我们的组织，谨严我们的纪律，以立强大的群众共产党之基础。”决议还指出，“我们须努力扩大国民党的组织于全中国，使全中国革命分子集中于国民党，以应目前中国国民革命之需要。同时我们特别的工作，须努力促成全国总工会之独立的组织，从事经济的及政治的争斗”^④。

根据张国焘的回忆，在表决陈独秀提出的上述决议草案之前，大会曾组织一个委员会对其进行审议。张国焘参加了这个委员会，并在会上提出一项修正案，大意是要求在草案中增加如下内容：“工人中的中共党员，除一部分有必要者外，不应全体加入国民党”。“不应采取积极介绍大批工人加入国民党的政策”。这项修正

① 《张国焘给维经斯基、穆辛的信》，《“二大”和“三大”》，第221—223页。

② 《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第242页。

③ 同上，第239—240页。

④ 《“二大”和“三大”》，第182页。

案最终以一票之差被否决^①。马林在给共产国际领导人的报告中也曾说,陈独秀“提纲中有一项在决议〔起草〕委员会中受到攻击,对这一项作出决议时,陈独秀的意见以 21 票赞成 16 票反对获得通过”^②。不知两人讲的是否同一件事。

总之,中共“三大”围绕着国共合作问题进行的大辩论中,以张国焘为代表的“左”派意见基本上被否定。在选举新一届中央委员时,张国焘也落选了。大会通过的决议把加入国民党,从事国民运动作为党的主要任务。同时,要求在政治上和组织上保持党的独立性。这就表明,在如何理解共产国际一月决议的问题上,大会基本上接受了马林的意见,而与共产国际东方部领导人萨法罗夫、维经斯基等人的意见大相径庭。

在中共“三大”会议结束的当天,马林在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信中,汇报了大会关于策略问题的讨论情况^③。他不仅严厉抨击了张国焘在政治上的错误主张和组织上的破坏活动,也指责共产国际中的“反对派”和一些俄国同志“曾娓娓动听地阐述过一些与现实毫不相干的趋向”,并指名批评拉狄克在共产国际四大上“根据不真实的情报”,强调中共应“在共产主义旗帜下进行独立的政治活动”,要求“尽快有一个群众性的政党”。他还揭发共产国际东方部内有人当着张国焘的面谈论在中国问题上共产国际中存在着左、中、右三派,指出“这样的情况本不该发生。”

应该说,马林在为自己的策略辩护时,确实讲了一些过头的话,如他在批评对中国的党和工人阶级的力量估计过高的意见时,曾说过:“党是个早产儿”,“是有人过早地制造出来的”,中国工人阶级“无论从数量和质量上说,他们都不是建立群众性共产党的好材料”,在工会的宣传中“绝对不要为此目标打出共产党的旗帜”等

①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1册,第295页。

② 《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第248页。原文〔起草〕二字可能为译者所加。“三大”并未设决议起草委员会,疑为决议〔审查〕委员会。

③ 同上,第242—251页。

等。这些提法不能不说是极端片面的、错误的，因而被“反对派”抓住，攻击他要“解散共产党”。实际上，当时工人群众中确实存在不少问题，特别是“二七”惨案后，部分工人产生了畏惧共产党的心理，党和工会中也发生了不少矛盾。这使马林一时过于悲观。实事求是地说，他并没有搞垮共产党的想法。就在上述信中，他表示同意陈独秀的看法，认为党在“一大”时还“悬在半空”，到“二大”时，“就脚踏实地了”，“最近一年的情况表明，党在组织工人加入工会方面有了进步”。他一直致力于发展和壮大中国共产党，总是争取从苏联援助国民党的经费中，多拨一些给中国共产党。他并不是从根本上反对把中共建设成为一个群众性的党，只是认为在当时的条件下，单纯依靠独立地发展工人运动，不可能很快出现一个群众性的共产党，而只有通过加入国民党，努力从事国民革命运动，中共才能更快地发展壮大，为建设群众性的共产党准备基础。至于说他“崇拜国民党”，这也是一种夸大其词的说法。如果说他在第一次来华期间，还没有深入了解的情况下，对国民党“曾有相当好的印象”，那么随着了解的加深，他对国民党的弱点和问题曾经多次提出严厉的批评。在他最后离华前致廖仲恺的一封信中，就直率地指出，“虽然国民党的三民主义是革命的，然而在实际行动上却日益封建化”，“党没有成为国民运动的领导者，却与各封建军阀为伍”。还说，如果党不改变方向，着手党的改组，“党的前途就肯定是暗淡的”^①。这怎么能说是“崇拜国民党”呢？

马林坚信国共合作的策略是正确的，因而为实现这一目标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和坚决的斗争。中共“三大”以后，共产党员、青年团员以及大批工农群众纷纷加入国民党，积极帮助国民党改组。他离开中国不久，国民党即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革命统一战线正式形成，并以此为起点，逐步掀起第一次大革命的高潮。中共“三大”以后，经过短短3年多的时间，中共党员

^① 《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第301—305页。

即由 420 人发展到近 6 万人。实践证明，马林倡导并积极推动的国共合作策略，既符合列宁关于民族与殖民地问题的理论，也适合中国革命的实际，可以说这是中国革命当时唯一正确的选择，也是马林对中国革命以至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重大贡献。

应该指出，马林在华期间的工作也有缺点和不足之处，主要是对统一战线中争取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和坚持共产党的独立自主原则强调得不够。在统一战线正式建成之前，党内主要危险是“左”倾宗派主义的条件下，马林的上述缺点和不足，对当时的革命工作尚未造成什么实际的损害。至于 1927 年大革命的失败，那是由于包括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路线在内的各种主客观因素造成的。而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是在 1926 年底以后才形成的。这同 3 年多前早已离开中国的马林是没有多少关系的。

尽管实践越来越有力地证明马林关于中国革命的意见是正确的，他创议的国共合作方向直到 1927 年国民党叛变之前，一直被坚持下来，然而，无论在中国，还是在苏联，反对他的人依然不肯认输，并且一直把右派的帽子加在他的头上。马林作为参加中共“三大”的共产国际代表，在“三大”结束后，只好于 1923 年 8 月中旬离华赴莫斯科，在共产国际东方部挂名任职。莫斯科当时正弥漫着“左”倾情绪，张国焘也向共产国际告状，攻击马林右倾。在这种情况下，马林不能不陷于孤立。8 月，联共中央决定派鲍罗廷到广州担任孙中山的顾问，11 月，共产国际又委任维经斯基为驻华代表。这使马林争取重新以国际代表身份来华工作的努力完全落空。1924 年 3 月，他只好辞去东方部的工作，返回自己的祖国荷兰。1927 年后同共产国际完全决裂。

1925—1926 年胡汉民的莫斯科之行

李 玉 贞

1925 年廖仲恺遇刺后胡汉民险些被捕,在广州失去了立足之地,被“放逐”到了苏联。在莫斯科他会见了苏联党政军和共产国际的领导人,打算说服共产国际接纳国民党为一个支部以取代中国共产党在共产国际的地位。

(一)

胡汉民自 1905 年在日本东京加入同盟会后,一直跟随孙中山,辛亥革命后被任命为秘书长,参与国民党的决策。1922 年,孙中山作出与中国共产党合作的决策,胡汉民虽然当时表示“有保留的支持”^①,但他想从根本上解决国共关系的问题,“彻底甩开”中国共产党。1925 年 8 月,廖仲恺被刺,胡汉民作为外交部部长,负有道义上的责任,被放逐到苏联。1925 年 10 月 2 日,胡汉民携女儿胡木兰,与朱和中、李文范、杜成志一起乘俄国轮船赴苏联。

胡汉民赴苏时,汪精卫以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名义给俄共(布)中央委员会写了一封介绍信,称自从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领导人就有意派员赴俄,因各领导均不得脱身,“兹者胡汉民同志以政务繁冗,身体不适,有转地疗养之必要,本党托其来俄一行,既有益于疗养,又得趁此机会与诸先生会晤”,信中介绍了胡的身分:“现为本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及政治会议委员,又兼政府委员及外交部长

^① 蒋永敬:《胡汉民先生的重要史绩及其影响》,《传记文学》第 28 卷,第 6—9 页。

等要职”；关于胡的使命，信中说胡将与莫斯科诸位先生商榷“为关于政治经济之一切重要问题；关于党的组织、宣传各种问题，及中国国民革命时代所应取之策略等等”；关于胡的职权范围，信中明确：“本党已授权与汉民同志，俾得与诸先生详细接洽，报告于本党斟酌执行”^①。简言之，胡汉民需要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商谈的一是关于国民党的党章党纲，二是涉及“中国国民革命时代所应取之策略”，这就势必接触国共关系的处理，具体到国民党的“策略”则又出现了国民党加入共产国际的问题。

（二）

1925年10月18日一个晴朗的星期日的早晨^②，胡汉民一行到达莫斯科火车站，受到了优厚礼遇。苏俄外交人民委员部东方司长麦利尼科夫进入车厢，陪胡一起下车。仪仗队列于站台上，就地举行了欢迎会。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片山潜、农民国际代表、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代表相继发言，称胡为“兄弟的广州政府的代表”。

维护国民党和三民主义是胡汉民在莫斯科扮演的角色之一。为制定国民党党章，胡汉民在他“工作计划”中的“国民党的策略与组织问题”部分里首先强调的是国民党的领导地位^③。为了说明国民党面临的任务，他认为应该明确以下三个问题：一，如何看待三民主义；二，如何实施三民主义；三，中国革命的理论基础^④。为达到预期的目的，他煞费心机，搜索枯肠，动用了种种手法。

1、力图把国民党打扮为“无产阶级”性质的政党，以证明中国

① 吴相淑：《胡汉民先生年谱》，《中国现代史丛刊》第3册，第218页。

② 苏联《真理报》1925年10月20日记载，胡汉民一行到达莫斯科的时间为10月18日。

③ 《胡汉民在莫斯科的工作计划》，《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第1卷，莫斯科1994年版，第670—671页。

④ 同上，第671页。

共产党没有必要存在。胡汉民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会议上发表的讲话说广州的工人运动是国民党领导的，上海无产阶级则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因那里国民党的力量相对小一些^①。他几次或著文或讲演驳斥“中国国民党是代表小资产阶级的”的说法，认为国民党的阶级基础是“植基于工农阶级而为全民的利益”。很清楚这一切的潜台词是中国共产党没有必要存在。然而胡汉民非常巧妙地表述了自己的意思，话到嘴边留半句：“老实说，国共关系的现状并不能令人满意。现在跨党共产党人的策略对国民党中央委员会讳莫如深。应该让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知道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策略。我向鲍罗廷说过这层意思，他也同意我的看法。但是中共党员反对中国共产党公开活动”^②。为了说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的领导非国民党莫属，胡汉民强调国民党要以三民主义为指导思想，强调“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又名共产主义，共产主义是民生的理想，民生主义是共产主义的实际，所以两种主义没有什么分别”。胡汉民还巧妙地把孙中山推崇的美国亨利·乔治的“民有、民治、民享”同苏式共产主义相比拟，甚至说这样做下去，“人民对于国家不止是共产，什么事都可以共的”^③。经过一番讨论，拉菲斯也不得不承认，关于国民党的纲领，应该写明的还是“国家资本主义”即“民生主义”^④。

2、围绕中国共产党的地位同拉菲斯正面交锋。尽管胡汉民躲闪闪，拉菲斯还是听出胡汉民上面那些话的根本意图，并且反复向胡说明：

“国民党的使命，是为建立统一独立的中国和革命民主政权而

① 《拉菲斯同胡汉民的第二次谈话》（1925年12月7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第1卷，第678页。

② 《拉菲斯同胡汉民的第一次谈话》（1925年11月12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第1卷，第676—677页。

③ 胡汉民：《中国国民党的真解》，1925年10月。

④ 《拉菲斯同胡汉民的第二次谈话》（1925年12月7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第1卷，第682页。

奋斗,由这个政权去满足亿万农民和工业无产阶级的最低社会要求。革命知识分子、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应该是国民党的社会基础,在制定党纲时,必须予以考虑。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有阶级性的政党,其使命是团结无产阶级,由这个阶级去完成其历史使命即建立共产主义社会。中共最终的政治任务是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建立苏维埃政权。中国共产党当然力争把广大的农民阶层团结在自己的周围。为中国国民革命运动的胜利而奋斗是党近期的政治任务。在这一点上,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的任务近似,这就是共同战斗和互相联合的基础。但是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一个阶级的政党。这个党的社会基础比之于国民党的社会基础要狭窄些,可中共的终极目标却比国民党的终极目标远大得多”^①。

胡汉民不愧为谈判高手,他根本不理睬拉菲斯说的国共两党当前目标与终极目标的异同,却使用了一个“顾左右而言他”的手法,说国民党“是接近共产国际的”^②。

听到这里,拉菲斯不相让了,他一针见血地点破胡的要害:

“我们还是有很多模糊的东西……如果照您的说法来确定中国共产党的任务,并否定它独立的社会基础,那么这个党的存在对中国革命来说就有害无益,而将其解散则为上策了。”

胡汉民反驳拉菲斯道:“如果您从我的话中得出这样的结论,那我们就很难谈下去了。我认为中国共产党还要继续存在下去,完全不该解散。”接着胡摊出了底牌:“国民党这方面,则应当力争加入共产国际”^③。

3、采取“以攻为守”、貌似左倾的策略,声称要把那些不能“正确理解三民主义”的人开除出国民党,以维护国民党的“纯洁性”。胡汉民对被冠以“左”字头衔非常得意。他站在“左”的立场上指责国民党内一些人不能正确理解三民主义,说他们不是革命队伍中

① 《拉菲斯同胡汉民的第二次谈话》(1925年12月7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第1卷,第679—680页。

②③ 同上,第680页。

的人，是三民主义的叛徒，对这些人要采取严厉立场，要把他们从国民党“开除出去”，甚至要“清党”^①。胡汉民也指出小资产阶级“不理解”国民党关于世界革命的理论，国民党应该制定一个“革命的党纲”，其立意和文字应该“清楚、确切”，以保证国民党“把全国所有的革命分子吸收”进来，并从理论上保证三民主义的实施，而不致把国民党“变为一个机会主义政党”。拉菲斯觉察到了胡汉民的“左倾”而提出了不同看法，建议国民党把小资产阶级、民主人士、知识分子和部分农民阶层团结在周围，而不要实行过左的政策，以免“吓跑小资产阶级”^②。

4、提出国民党加入共产国际的要求，正式向共产国际摊牌。胡汉民做了上述姿态后，一则取得了共产国际执委会的信任，维持着左派封号，二则为他承担的使命开辟道路，创造资本。他到苏联后提出的此行6个任务之一就是：“国民党要开展国际宣传和建立国际联络”^③。胡汉民谈到“不能正确理解三民主义”时也暗示了中国共产党人，他同拉菲斯谈论国共关系时说，只有“正确理解和实行三民主义，国共合作才能成立”^④。他几次提到国民党“右派”对共产党人的态度，即他们不反对中国共产党的存在，但“反对中共加入国民党”，或者是他们赞成联俄但“反共”^⑤。胡汉民表面上批评这些右派，实际上是赞成他们的主张——不许共产党人宣传共产主义或“曲解”三民主义。

1925年12月7日，胡汉民利用同拉菲斯第二次谈话之机说据三民主义的实质特别是其民生主义的实质来看，国民党更加接

① 《拉菲斯同胡汉民的第一次谈话》（1925年11月12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第1卷，第676—677页。

② 同上，第676、677、683、684页。

③ 《拉菲斯同胡汉民的第三次谈话》（1925年12月12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第1卷，第674页。

④ 同上，第676页。

⑤ 《拉菲斯与胡汉民关于中东铁路冲突一事的谈话记录》（1926年1月26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第2卷，莫斯科1996年版，第31页。